

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 ——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

张瑾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西奥多·怀特 中文名字白修德 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1939年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此间,采写了大量中国抗战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又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成为中国抗战历史、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重要目击者与记录者。白修德档案现为哈佛大学档案馆独家收藏,共计232盒,内容覆盖其48年记者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历史十分珍贵的海外人物档案之一。本文拟从新近发掘海外人物档案的角度,通过对白修德档案中重庆文本的介绍与解读,探究战时重庆图像及其史料价值。

[关键词] 西奥多·怀特 白修德档案 战时重庆图像 海外档案的价值

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中文名字白修德,^①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1939年4月11日,白修德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并受雇于重庆国民政府中央新闻宣传机关。作为新闻记者,重庆是白修德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此间,他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②访问延安后又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作为影响战时中美关系的在渝美国人,重庆的经历使他成为中国抗战历史,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重要目击者与记录者。

白修德个人档案的主体部分现为哈佛大学档案馆独家收藏,纸质档案文献分职业文件与私人文件两类,共计232盒。^③时间跨度从1922年至1986年,内容覆盖其48年记者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2-12-16

[作者简介] 张瑾,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 本文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China-US Relations in Wartime Chongqing: A Study of John K. Fairbank and Theodore H. White”(Fulbright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 Program, 2011-2012, Grantee ID: 68435211)的阶段性成果,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研究中心“现状与未来:档案典藏机构与近代人物研讨会”会议论文的修改稿。

① 根据白修德档案中的个人名片资料,西奥多·怀特的中文名字——白修德应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获得,他到中国的第一张工作名片写道:美国哈佛大学派遣留学生白修德(1938-1939),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 222, Folder 2, China Memorabilia and Calling Cards,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当抵达重庆之后,白修德的证件显示了他中译名字的变化。1939年6月20日-12月19日,在他随身携带的“重庆市外侨居住证”(第0169号)中显示,24岁的白修德受雇于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职业为“新闻业”,中文译名则为“怀德”;1939年9月7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签发的“两年有效”期的“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第50号,“怀德”的中文名字被替换为“白修德”,其身份则为“美国美联社记者”;另据1943年“重庆市外籍居民身份证”(第010521号,1943年1月12日签发),中文译名依旧为“白修德”。此间,他出入重庆奔赴战区的记者证上均以“白修德”为中文译名。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 222, Folder 1, Chinese Memorabilia and China Press Cards, 1938-1945。

② “国民政府发给中外记者赴各战区随军工作证明书”,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 222, Folder 1, Chinese Memorabilia and China Press Cards, 1938-1945。

③ 哈佛大学档案馆还收藏有白修德档案的视听文献,如:会议录音、采访录音及录像磁带等。见 Papers of Theodore H. White: Audio Visual Collection, 1955-1980, 档案检索号为13496,内容主要是围绕《总统的诞生》著作及文稿系列的采访记录,共计490余件。因与战时重庆无甚关涉,笔者并未调阅此系列档案。此外,他个人档案中有一小部分早年著作的初稿,约26卷盒,由他本人在1958年赠给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面。此外,在哈佛大学侯腾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还收藏有二战时期及战后《时代》周刊驻外国记者发回纽约总部的新闻电讯稿的微缩胶片,^①此系列文献可视为白修德个人档案的重要补充。

哈佛大学特藏的白修德个人系列档案数量极大,内容颇丰,是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历史十分珍贵的海外人物档案之一。然而,该档案至今尚未被学者系统发掘与运用。^②本文拟从新近发掘海外人物档案的角度,通过对白修德档案中重庆文本的介绍与解读,探究战时重庆图像及其史料价值。

一、白修德与重庆的渊源

1915年5月6日,白修德降生在马萨诸塞州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的犹太社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儿子,排行老二。父亲大卫·怀特是一位有着法律学位的俄罗斯移民。这位有犹太血统的律师靠其微薄的诉讼收入,几乎不能养活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全家人与白修德的外祖父母家合住在一起。尽管生活在贫寒的家庭,白修德本人却获得了出色的教育机遇。先是进入多尔切斯特的威廉·恩迪克特学校(William Endicott School)和克里斯托弗·吉布森学校(Christopher Gibson School),接着又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就读。在作为正统犹太教徒的外祖父母坚持下,他还先后参加波士顿的伯特利希伯来语学校(Beth-El Hebrew School)和希伯来学院(Hebrew College)的夜校学习。1931年父亲大卫·怀特去世,全家的生计不得不依赖家庭救济来度日。1932年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后,白修德就承担起养活母亲和三个姐妹的责任,为此被迫推迟两年上大学,在一家报社当报童。1934年,在伯勒斯报童基金(Burroughs Newsboy Foundation)与哈佛大学奖学金的资助下,白修德被录入哈佛大学,成为走读生(非住校学生 a commuter student)。在大学二年级,白修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成了唯一一位选择汉语为专业的本科生。刚刚当上教授不到一年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被安排做他的指导老师,这一机缘使得费正清成为他的重要导师,尤其是对他早年职业生涯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8年白修德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弗雷德里克·谢尔登旅行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费正清鼓励他选择新闻记者而不是去做一名历史学教授。这笔奖学金,为这位才毕业的大学生出国旅行奠定了重要的经济来源,^③而白修德与中国西部城市重庆的渊源也自此展开。

在重庆,白修德走上了职业记者之路。事实上,对于他而言,重庆早已超越了地理上的区域空间概念。1939年4月10日,白修德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最初,他受雇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宣传部,谋得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④他回忆说“我所领导的那六位新闻专栏作家像我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年纪都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他们都有在沿海城市的英文报社里当记者的经历。”^⑤重庆,为这位刚刚跨出校门,不足24岁的哈佛大学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历观察战时中国的大舞台。在那里他采访过不少国民政府高官,对“完全美国化”的重庆政府惊讶不已,对初迁

① Dispatches from Time Magazine Correspondents: First Series, 1942-1955 (MS Am 2090).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本系列共计55盒微缩胶片,直线长度72英尺。为1942—1945年间《时代》周刊驻各地记者发往纽约总部的新闻电讯稿。内容主要是国内外事务与教育等主题,尤其与外交和战争相关,按发出时间分组排序,每组包含1—5天的新闻,这些电报抵达总部后,被重新打字或复写并分发给编辑。其中,白修德从重庆发回的电讯稿与他个人档案中的相关文献有重合;系列二: Dispatches from Time Magazine Correspondents: Second Series, 1956—1968 (MS Am 2090.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有41盒微缩胶片,直线长度为53英尺。本系列内容上外交主题很少,且主要为电讯稿的复印件。还包括《时代》周刊华盛顿分社发来的每周备忘录和新闻故事建议与背景等文献。

② 迄今为止,海外学术界有关白修德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新闻记者生涯及其与《时代》周刊之关系,以Joyce Hoffmann, 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为代表。国内学者的成果则多在新闻史领域,主要围绕白修德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批判性报道,如40年代“中原大饥荒”的话题等。

③ 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④ 据白修德在此间的工作名片,其职位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副总编辑”,见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 222, Folder 2, China Memorabilia and Calling Cards.

⑤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22-26.

重庆的政府各层职员的敬业精神,还有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及生活状态充满了赞誉。^①不到一个月,重庆就遭遇了抗战以来空前残酷的大轰炸——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白修德亲眼目睹了这场“从空中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的最大规模屠杀”,并写下大量书信和文字,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国民政府积极有效的反空袭应对措施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白修德在重庆经历的亮点,是有机缘成为《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关战时中国的报道文本。1939年6月9日,白修德开始作为“特约通讯员”为《时代》周刊撰写新闻稿,他从重庆发往纽约总部的新闻稿,给编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被提升为《时代》驻重庆的首席记者。^②白修德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即使在日军实施狂轰滥炸时,他的写作也从未停止过。作为亨利·鲁斯的传媒帝国——《时代》、《生活》杂志在战时中国的明星记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从重庆发出权威信息的话语权。随着战争的进行,生活在陪都重庆的白修德,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③

1944年冬至1945年,白修德与亨利·鲁斯发生激烈的争执,核心分歧就在于对蒋介石及重庆政府的认识问题。^④1946年,他从《时代》周刊辞职,着手与贾安娜(Annalee Jacoby,1916—2002,《时代》周刊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合作撰写《中国的惊雷》,这是一部完整地记录蒋介石国民政府走向衰败与延安中共党人崛起的著作。^⑤1947年由威廉·施隆公司(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出版后被“每月新书俱乐部”(the Book-of-the-Month Club)推荐给它的百万会员。斯诺称之为“一部精湛的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东亚战争史略”。^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中国的惊雷》则可看作是白修德基于重庆的亲历者的观察记录。

在告别中国的战时首都之后,^⑦白修德的职业生涯曾一度充满坎坷,究其原因,与其在重庆的经历密切相关。1947年,他短暂担任《新共和》杂志编辑。在史迪威遗孀的请求下,1948年他编辑出版《史迪威文件》。他被打上了“太过于同情中国共产党人”,以及“战后环境中的左翼人士”的标签,而无法在主流媒体中获得国际记者职位。后来只是被一个很小的外国新闻机构——“海外新闻社”(Overseas News Agency)雇用,在法国巴黎工作。^⑧在欧洲的经历造就了白修德的第二部畅销书。1953年,他撰写的《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由威廉·施隆出版公司发行,该书阐述马歇尔计划之下的欧洲重建问题,再度入选“每月新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而一举畅销。1953年之后,白修德回到纽约,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记者》杂志工作。1954年,又为在重庆时期一起工作过的外交官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出庭作证,此间他本人也正被美国国务院安全听证委员会所调查。在庭审期间,白修德被指控为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一度被没收个人护照。因不满于《记者》发行人马克斯·阿斯科里(Max Ascoli)的专横跋扈,1955年他从该刊辞职,成为一名《科利尔斯杂志》(Collier's Magazine)的国内政治记者。尽管有着400万份的发行量,但该杂志仍然无法

① 白修德在《探索历史》中这样描述他初到重庆的感受“在最初几个星期内,这座城市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使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我的工作和宏伟的理想。”参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1-6。

②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3, folder 1, 6-7/1939。1939年12月,白修德从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正式辞职,次年春,他成为《时代》周刊“全新”的驻华记者。

③ “河南饥荒”及其报道,是导致白修德对重庆国民政府认识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白修德档案中,有关河南饥荒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系列二“中国与亚洲通信(1939—1948年)”的采访笔记,如: Box 51, Folder1, Folder2, Jan. 1943; Box 51, Folder4-5, Feb. - Mar. 1943, 及散见在他给《时代》周刊编辑部的电报和电讯稿中。

④ 白修德与亨利·鲁斯关系的恶化始于他对《时代》周刊编辑部“改写”他有关史迪威被召回的报道文本,这无疑与《时代》周刊的亲蒋政权立场产生裂痕。

⑤ 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⑥ 斯诺《序一》, [美]白修德、贾安娜著, 端纳译《中国的惊雷》,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年。

⑦ 根据“交通部新闻电报凭照”及交通部电信总局签发的“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照”证件有效期,可推测他离开重庆的时间应在1946年6月左右。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10, Box 221, Folder 2, Photographs Album, 1939-1940。

⑧ 1950年,“海外新闻社”倒闭,白修德继续在巴黎逗留了三年多,成为《记者》(the Reporter)和其他杂志的自由撰稿人。

与遥遥领先的《生活》、《观察》周刊抗衡,最终于1956年12月停刊。在离开《科利尔斯杂志》后他写道“我再也不会被任何人雇用了。”^①

白修德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作家,这一传统源于重庆时期,也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他日后职业生涯的辉煌成就。^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而闻名于世。^③著作善用小说的悬念和戏剧化手法,不仅成就了书的畅销,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报道的传统。1960年以后,有关总统选举活动的报道开始跳出日常竞选活动议程的分析,转而关注竞选背后的政治机制问题。这本《总统的诞生》也让他荣获1962年度的普利策非小说作品奖。此后,又在1964年、1968年和1972年连续写作三本《总统的诞生》。1975年,出版他个人对水门事件的分析著作——《背叛信仰》(Breach of Faith)。1978年,再出版了个人自传式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1982年,最后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著作《探索自身的美国》(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出版。^④

二、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本^⑤

现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的白修德档案,^⑥检索档案号为HUM1.10,系根据白修德的遗嘱于1986年他去世后捐赠的。1992年,这批档案获得大英百科全书一笔基金的资助,由哈佛大学侯腾图书馆的凯若琳·D·普勒斯顿(Caroline D. Preston)负责整理,档案登录号为12637。目前,该档案由哈佛大学档案馆对外开放。需要查阅的读者,凭个人有效证件即可阅读、复印与拍照。2011年3月30日,档案馆更新该指南,增加信函中的人名索引,并按姓氏音标排序,附录信函年月日及盒、文件夹号等信息。^⑦

档案按以下十个系列编排,战时重庆的相关文本散见于各档案盒:

-
- ① 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 ② 除去有关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著作系列,白修德还写下了大量主题多样的文章,如:美国政治人物、民权问题、城市发展、环境,以及打开中国的大门等。1962年后,他恢复了与“时代/生活”公司的联系,频繁为该公司下属《时代》、《生活》杂志写稿,与此同时也为《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撰文。他关于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剧本《凯撒在卢比孔河》(Caesar at Rubicon)(1968年出版),1971年上演。他还写过八部纪录片脚本,包括在中国获得的艾美奖作品《疯狂的根》(Roots of Madness)。
 - ③ 此前,白修德已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并于1957年决定将他二战时期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1958年出版《山路》(Mountain Road)。这本著作又一次成为“每月新书俱乐部”的推荐新书,成为最畅销的图书,也是一本决定他走向成功的关键之作。白修德将他的经历小说化的第二部著作是《从第四十层楼看到的景观》(The View from Fortieth Floor),该书于1960年出版。盖里卡普(Gary Copper)公司购买了小说的电影剧本版权,他用这笔收入投入到下一部小说《总统的诞生》,1960年。
 - ④ 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 ⑤ 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本”,其内涵是多元的。既有区域地理的城市空间概念,也有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的指代意义,还有战时中国大后方的含义。由于白修德话语中的重庆多与战时中国政治与外交相关联,“重庆”在他的视野中,更多是超越区域空间的政治概念,甚至可以理解为“重庆即中国”。
 - ⑥ 2007年夏,因获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基金资助(Jin Zhang, “The Commercial and Medical Modernization of Chongqing, 1890 - 1945,” A Friends of Princeton Library Grant, 2007 - 2008, Princeton University),笔者顺道赴哈佛大学访学一个月,首次阅读白修德档案,并重点查阅了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期间他的书信函件等卷宗。2009年夏,笔者再度赴哈佛大学,利用短暂一周的时间,阅读了他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时期的书信,以及从重庆发往《时代》纽约总部的新闻电讯稿。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在美国国务院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基金的资助下,笔者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哈佛访学近一年的时间里,围绕富布赖特项目,系统收集与整理了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相关文献。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白修德档案文献数量庞大,加之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手写稿书信、采访笔记及日记,因基于这部分档案阅读的难度,目前尚难估计信函中有关重庆时期的文本信息量。
 - ⑦ White, Theodore Harold, 1915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本文有关白修德生平及档案收藏系列介绍主要依据该指南。需要指出的是,该指南编目存在多处与档案原文在时间和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仅靠阅读指南会误读史料或遗漏重要文献。而美国档案文件夹编辑的“活页”方式,以及读者不规范的阅读方式很容易导致档案“盒”(Box)、“夹”(Folder)与原文内容错位。

系列一: 通信。本系列文档包括了白修德的私人通信和职业通信,时间跨度从1931年至1986年,共计49盒。信函分手写稿与打字稿,按时间顺序编排,并保留了他本人的归类方法,来信与复函分开编辑。白修德与编辑部有关各书稿或杂志文章的通信则以专题档注文件夹名。其中,重庆时期的函件主要集中在第1至第5盒,为他与家人、朋友及同事的通信,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抗战时期重庆文本。这部分信函除家书外,涉及的重要人物有:费正清、亨利·鲁斯及夫人克莱尔·鲁斯(Claire B. Luce)、《时代》周刊编辑约翰·赫西(John Hersey)、董显光、宋庆龄、宋子文、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约翰·戴维斯、温德尔·威尔基(Wilkie Wendall),以及在渝美国记者悌尔曼·窦丁(Tillman Durdin)、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贾安娜·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威廉·施隆等。实际上,1946年5月以后的信函,也是广泛意义的重庆文本。此外,他与母亲及家人的通信往往为长信,其中也包含有相当丰富的重庆时期史料,但手稿信函的辨认和解读十分困难。

系列二: 中国与亚洲通信。本系列为中国文献专题,也是重庆史料的核心内容,时间跨度为1939—1948年,共计13盒。具体包括:(1) 采访笔记。(2) 每日发往《时代》周刊的新闻文电。^①(3) 早年有关中国问题的未刊书稿《犁头成剑》(Ploughshares into Swords)的手写稿第一、第二稿。^②(4) 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未刊文字,尤其是《中国的惊雷》一书的手稿,该书与《史迪威文件》的书评剪报等。^③(5) 大量在中国时期的照片、备忘录和记者证、名片等实物,以及发表中国专题文章的剪贴簿。其中,在1939—1945年间作为《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与编辑部的通信十分珍贵。系列一与系列二的档案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尤其是重庆时期的信函纸张易碎和破损严重,部分文件采用以复印件替代,原件已被限制阅读。

系列三: 欧洲通信。时间跨度从1948—1953年,共计13盒。包括:(1) 记者采访笔记。(2) 新闻报道稿。(3) 杂志文章。(4) 《灰烬中的火焰》书稿专题。(5) 欧洲的回忆录等。白修德在巴黎时期与家人的通信,与O. N. A.的机构管理人员,与杂志社、书稿等编辑的通信均归入系列一之6至11盒通信文件夹内。尽管此时他已经离开重庆,第一部著作《中国的惊雷》也刚刚出版不久,但在欧洲工作的他,信函和新闻稿中关涉战后中国的内容,也是研究战时重庆的重要文献。

系列四: 杂志文稿。时间跨度从1946—1986年,共计22盒。主要包含白修德在1946—1986年间撰写的调研文字,以及投往杂志文章的手稿。档案按照采访笔记、研究笔记、初稿和定稿文本,校对数据,以及文章定稿打印稿等分类排列。也包括1955—1956年在《科利尔斯杂志》的文稿和回忆,以及就职于《新共和》杂志社(见第95—97盒)的文档。值得注意的是,本系列档案也有部分《中国的惊雷》手稿的文本信息。

系列五: 美国总统选举与政治类书稿。时间跨度为1960—1985年,共计75盒。包括七本有关美国政治的书稿手稿及研究文件,如《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1964、1968、1972年版手稿本,以及其他著作,如《违背信仰》、《探索历史》和《美国探索自身》等书稿。此外还包括人物采访日记、采访记录的手稿、书稿写作的修改稿、广告和销售记录,以及述评剪报等,这是白修德个人档案中重庆经历之外最大的专题系列。

系列六: 小说、剧本和其他作品。本系列时间跨度为1940—1986年,共计20盒。内容包括白修德创作的小说(如《山路》、《从第十四层楼看到的景观》)、剧本《凯撒在决战》以及纪录片电影剧本,各种演讲、未刊稿作品、研究笔记、宣传报道、书评等文献。其中早期文献系重庆时期的作品,是研究抗战重庆的重要文献。

^①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52, Series 2: China & Asia Correspondent papers,为1942—1943年战时电报系列。

^② 该书的第一章“Chungking: 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是白修德关于重庆的早期认识的重要文本。

^③ 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及《史迪威文件》手写稿文献的主体收藏在约翰·肯尼迪图书馆(John F. Kennedy Library)。

系列七: 日记与采访约会日程表。时间跨度从 1938 年至 1986 年, 共计 10 盒。本系列是白修德的活页手写稿日记, 以及每天的工作日程和计划。其中第 193 盒有三个文件夹为 1938—1945 年间重庆时期的日记手稿。

系列八: 董事会、委员会和咨询顾问文件。本系列时间跨度是 1958—1986 年间, 共计 13 盒。白修德有许多董事会主持的头衔, 并在多家咨询公司里有职位。档案有较为系统的大英百科全书和 CBS 咨询顾问记录和管理日记。

系列九: 私人文件。本系列时间跨度为 1928—1984 年, 共计 8 盒。包括家书、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学院时期的档案、照片簿及纪念品等。其中, 重庆时期的图片及实物文献十分珍贵, 比如 1939—1943 年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时期的照片影集, 真实再现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以及主要交往人物的信息。^① 他收藏的纪念品中, 有记者证、防空通行证、重庆市外籍居民身份证、外侨居住证、通讯录本、银行支票本、获奖证书、西方驻渝记者名片和著作中的宣传肖像等,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轰炸时期重庆的社会生态——躲空袭与疏散的生活实况, 以及二战时期西方新闻界驻渝的情况。^②

系列十: 印刷品资料。时间跨度为 1939—1986 年, 共计 9 盒。本系列完整保存了白修德在国内外的出版印刷品, 以及他在 1939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这一部分史料为集中阅读白修德的战时重庆文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三、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图像及意义

笔者以为, 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本是抗战时期重庆历史乃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值得高度重视的新史料。^③ 该档案丰富的战时中国文献专题, 为研究重庆国民政府历史、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官方及民间外交)、国共关系、中共党史以及重庆城市变迁等, 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观察视野。

白修德档案以完备的战时重庆信函、日记及记者采访笔记等, 描绘出战时首都复杂而多维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图景; 而他极为细致、谨慎地保存照片、书稿修改稿本及纪念实物的严谨态度, 更为其档案增添了亲历现场的史料价值。

发掘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献, 最初源于笔者有关“西方人眼中的重庆图像”系列的研究课题。事实上, 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本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的西方人士对重庆的描述。^④ 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 (1) 白修德在战时新闻界特殊的身份, 即西方主流媒体——《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 (2) 导师费正清对其职业选择及“中国观”的深刻影响; 而重庆时期, 费正清与白修德的函电

① 照片展示的重庆景观: 如 1939 年从南岸拍摄的主城区全景, 日军轰炸中燃烧的城市, 以及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市; 有他住宿地“巴县中学”的外景, 有在房间内打字的工作照, 还有外国新闻记者的合影, 以及在外宾招待所交流的场景; 照片中也体现出他采访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事实, 如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重庆官邸花园中下棋的照片, 有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 1940 年在渝期间的珍贵合影。这一组照片共计 60 余张有蒋介石参与的宋氏三姐妹与妇女界的聚会, 不少为多张连续拍摄的图片, 体现出与中央社刊布照片的不同视角, 显示出白修德本人之手, 有一种现场的动感。参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 221, Folder 2, Folder 3-4, Folder 5-6, Photographs Album, 1939-1940。

②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 222, Folder 2, Chinese Calling Cards, 1938-1945.

③ 中外学术界至今尚未有系统地对战时重庆的视角对其进行发掘与运用。现有使用过白修德档案的美国学者成果中, 研究的主题与重点集中在他的记者职业生涯及其成就, 有关他在重庆的经历仅作为其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考量。而哈佛大学档案馆白修德档案指南中有关他的生平简介, 则体现了美国学术界的这一研究趋势, 见 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 -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UM 1. 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④ 曾经旅居重庆的格莱姆·佩克(Graham Peck) 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也曾以其“重庆印象”文字为美国公众塑造出战时中国形象。不过, 相比而言, 他们短暂驻渝经历, 未能产生出白修德的影响力。见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此外, 从在渝美国新闻界人士口述回忆, 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重庆时期白修德的独特地位和角色。见 Stephen R.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往来,又进一步持续深化着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3)白修德早于(1939年4月开始)大多数战时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抵达重庆,他有着与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几乎同步的大后方生存体验与实践;(4)他卓越的写作能力、勤奋多产以及善于保存个人档案的习惯,使其个人档案因保存完备而意义重大。

公开出版的白修德作品,集中描绘重庆图像的著作有两部,即《中国的惊雷》(1947年英文版)与《探索历史》(1978年英文版)。相对说来,哈佛大学特藏的白修德档案中重庆图像的文本,无论在数量或者涉猎的主题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上述两部著作的内容,史料价值极高。概括而言,档案中重庆图像的文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轰炸中的战时首都及其社会生态。就狭义上的重庆文本而言,大轰炸及其社会生态是白修德档案中以区域为中心的重要内容。重庆遭遇日机的轰炸始于1938年2月。从2月到11月,日军对重庆周边到主城进行多次试探性的轰炸。12月,日本陆军更以天皇名义下达的“大陆命令第241号”及“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对重庆的战略和政略中枢实施“战略轰炸”,“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上下”。^①到1943年8月23日,这种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长达五年半时间。白修德对日军轰炸重庆有相当细致的记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灾难中的城市图像及后方社会生态,其中尤其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的记录为珍贵。从1939年5月3日开始,白修德就以信函或文章,向亲友和媒体传递重庆遭遇巨大灾难的信息。另外,白修德也写日记。从时间上看,他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记载,主要集中在1939年和1940年;从文献形式看,除去为《时代》周刊等撰写专题文稿外,公私信函是他传递重庆轰炸灾难信息的重要方式。^②他擅长写长信,尤其是给家人的私人信函中,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及其空袭状态下的日常生活是必谈的话题。他甚至以写诗投稿、用印刷有大轰炸照片的贺卡向外传递日军轰炸重庆细节的方式,保存珍贵的图文史料。^③此外,档案中保存有较为完备的在渝时期日常生活的开支记录,如房租、交通等重庆市内的生活开支,以及进出重庆的交通旅费等文本,是研究大轰炸生态下的重庆经济社会的重要文献。

(二)《时代》周刊首席记者的重庆岁月。就广义的战时重庆图像而言,白修德个人特殊的身份,使其重庆图像及文本超越了区域的范畴,更具话语的影响力。与《时代》周刊编辑部的通信以及发往纽约总部的电报、电讯稿是白修德档案中战时重庆文献的核心内容。自1939年6月,他以“特约通讯员”身份开始为《时代》周刊撰稿,与编辑部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这些资料包括:与亨利·鲁斯的通信专卷,以及一套十分完整的发回《时代》周刊纽约总部的新闻电讯稿;与新闻界同行的信函、战时日记与采访笔记等;记载重庆国际新闻界的记者招待所的细节;战时宣传、广播等主题,均展示了一幅重庆国际新闻界的舆论动态图景,尤其是西方记者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史料十分珍贵。^④

重庆是白修德观察战时中国的窗口。此间,他亲历了影响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皖南事变、河南饥荒报道、史迪威事件、美军延安观察组、重庆谈判等。他以《时代》、《生活》与《财富》杂志的记者身份,从重庆出发赴各战区,甚至奔赴亚洲各国,其关注的话题相当广泛,不仅有战区前线

① [日]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译《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期间的战略大轰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页。

② 此间有关重庆所遭遇日军极端野蛮而恐怖的轰炸,参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 1, Box 2, Box 3, Box 51, Box 53(folder 10: Chungking Air Raid; folder 11: Chungking Air Raids; folder 12: bombing of Chungking; folder 14: Bombing of Chungking;), Box 54(folder 5: Chungking Bombings), Box 221, Folder 2, Photographs Album, 1939-1940。

③ 参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60, folder 30;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2, folder 24Correspondence, Incoming ca. 1940 (including fragments)。

④ 参见 Papers of T. H. White, HUM 1. 10, Box52, Box54, Box55, Box223, Box61 等与《时代》周刊编辑部的通信及新闻电报、电讯稿。

的抗战报道,有重庆的工业、金融业及通货膨胀等经济生活主题,更触及战后中国重建等诸多问题。^①

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白修德周旋于国共两党高层人士之间,也活跃于陪都的西方新闻界。他在重庆时期的信函,关涉的历史人物从中美高层外交官员、公共知识分子、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以及在渝美国新闻界人士,为研究战时重庆国民政府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中外人物图谱。

(三) 重庆国民政府与在渝中共党人。白修德既是重庆历史的亲历者,也是战时中国形象的塑造者和传播者。他建构的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形象,以《中国的惊雷》为典型话语。事实上,《中国的惊雷》对于国共双方而言都具有象征意义。该书集中体现了白修德以重庆为观察点的战时中国观,所描绘出的重庆国民政府与在延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白修德档案所提供的《中国的惊雷》书稿生产过程的种种文献,有关围绕该书的出版发行的通信、销售宣传等文本,以及书稿从初稿到定稿的手写修改稿打印本等细节,其价值也远远超越文本本身。从这个意义而言,白修德档案的发掘,无疑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著作及其意义的珍贵史料。需要指出的是,白修德笔下的重庆是一种政治的意义的符号,他以极富政治化的语言所建构出的战时重庆图像,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的形象。

而在渝期间的记者身份和新闻实践,使他得以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及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龚澎有了密切接触,也让白修德深深介入与中共的民间外交事务,他以在渝美国记者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扮演了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在渝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传播者。档案中保存着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细致记录,如他与周恩来、龚澎的交往,均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手稿笔记和日记。^②

(四) 以重庆为舞台的战时中美外交。重庆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二战期间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活动的发端期,更是美国与国民政府外交关系的关键转型期。白修德无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白修德与国共双方高层人物的交往信函及相关文献,勾画出重庆时期国民政府的官方外交与中共的民间外交并行的多元政治图景。

以重庆为舞台的中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框架。就官方外交而言,白修德档案的重庆文本的发掘,可以突破长期以来仅仅关注战时中美关系中上层人物的局限。战时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官方重要人物,在渝美国人中的其他人物均在白修德笔下出现。就民间外交而言,战时重庆的舞台,在相当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度认识战时中国多元性与复杂性的广阔空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以重庆为舞台,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创造性地拓展与主要同盟国美国的外交关系,其成就对战后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修德档案中保存有相当丰富的在渝民间外交的史料。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白修德的重庆经历,为我们深刻认识战时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 陈文彬]

^① 参见档案系列一、二之信函以及《时代》未刊电报、电讯稿等;有关战后建设如: Theodore H. White, *China's Postwar Plans: How the Chinese are Today Translating Sun Yat-Sen's Sketches into Blueprints for a New China* (New York City: Time Inc., 1943. Reprinted from *Fortune*, October, 1943)。

^② 参见 Box50, Folder 3, 6, Box51, Series 2: China & Asia Correspondent papers, Fol. 7, 6-10/1943 1. Chou Enlai 2. Misc 3. Kung Peng。

Exploring the Images of Wartime Chongqing from Overseas Archives: A Case Study on Theodore H. White Papers at Harvard University

ZHANG J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Chongqing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44 , China)

Abstract: Theodore H. White (Chinese name Bai Xiude , 1915-1986) was an American journalist , and Time magazine's Chongqing chief correspondent during World War II. As a Harvard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 White became Fairbank's first disciple. After his graduation , White arrived in Chongqing in 1939 with Fairbank's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and began his life as a journalist. He submitted a vast number of reports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 and , after visiting Yan'an (the Communist base) , wrote the influential book *Thunder out of China*. As Time's chief reporter , White became an important eyewitness and recorder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Chongqing 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odore H. White Papers is the exclusive collection i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 and these papers cover every aspect of his 48-year career as journalist , a total of 232 boxes. The collection is one of the very precious overseas personal profiles on the studies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This paper , from the angle of newly explored overseas personal profiles ,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 H. White's Papers' Chongqing texts , examines the images of Wartime Chongqing and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overseas archives.

Key words: Theodore H. White; papers of Theodore H. White; images of wartime Chongqing; value of Overseas Archives

“French Theory” in France

LU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Being understood as a whole of various French avant-garde theories after their American re-packing , “French theory” being back home today in turn enhances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which is far from extinguished. Francois Susset's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 Derrida , Deleuze , & C.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 is but one case among many. One consensus on its reflection however , is that it is not proper for theory to replace text analysis. In a degree , it explains why works of authors like Foucault and Derrida have not entered French classes so far. Yet theory after all is humble , for it is going to interpret the weakness , the non humanistic side of human being. In this perspective , “French theory” should not become a nostalgic term , instead ,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will be served in new contexts.

Key words: French theory; Sokal effect; Cusset; text analysis

Renato Poggioli's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QIAO Guo-qiang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83 , China)

Abstract: The Italian scholar Renato Poggioli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estern theorists on avant-garde in the 20th century. He discussed many issues in terms of avant-garde such as the term avant-garde , politics , fashion , etc. , in his *Teoria dell'arte d'avanguardia* (1962) . Many theorists also talked about avant-